

國際社會化與全球治理

王 啟 明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班)

摘 要

政治社會化所關注的問題是行為者成為一個團體、組織或社會成員的過程，學習有助於適合其所屬政治體系的價值、態度和適當的行為。亦即，研究個人如何形塑「政治行為定向」以及「政治行為模式」。而國際社會化是一種引導一個國家朝向將國際環境所構築的信念與規範予以內化的過程。本文則是透過政治社會化研究途徑來解析國家如同個人在進行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學習歷程，並以霸權國的影響、國家的學習、共同利益的認知、國際組織的作用以及法制化等五大分析變項作為分析指標，並就「經濟暨貨幣聯盟」政策為個案研究，來理解國際社會化的意涵。

關鍵詞：國際社會化、法制化、國家學習

* * *

壹、研究動機

一個人在政治上的行為定向及行為模式，常常是通過實際生活經驗及有形的學習方式所形成的，此種過程，即是政治社會化的過程。^①當然，研究政治社會化過程的主體仍是以個人為主，個人如何獲取「政治的行為定向」與「政治的行為模式」，這一發展過程，便構成政治社會化研究的範疇。不過，在國際關係的研究領域中，國家被視為在國際社會環境系絡中研究的行為主體，^②而國際社會所形塑的規範亦藉由類化於個人的政治社會化歷程，轉入國家的行為曲目之中。

當然，在後冷戰時期，尤其在蘇聯解體之後，象徵著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隨之崩解，國際體系由兩極對抗的態勢轉變為多極競合，其中，多邊主義、區域主義的效益，以及國際建制扮演著國際規範建構與執行的角色，而國家在此一架構下，藉由學

註①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出版社，民國 82 年 12 月），頁 111。

註② 對於國際關係的行為主體意涵蓋國際組織、非國家組織等行為者，而本文則著重於國家的行為。

習的歷程開展其社會化的歷程。

一九九〇年代，在國際關係領域中，興起「全球治理」的討論浪潮，與此同時鑲嵌著「全球轉變」的議題，使得國際關係學門的研究重心，從區域整合、國際建制的研究，轉移到「全球」的概念議題上。

「全球轉變」成為目前國際關係領域中的重要議題，也使得「全球治理」的概念從中浮現，其中的關鍵在於冷戰結束之後，國際社會所關注的議題，除了安全議題之外，還包括因全球化浪潮下所產生的經濟、文化、政治領域中「治理」的問題。國家間透過社會化所達成穩固國際體系的目標，亦在全球治理的概念下，產生延續性的脈絡，國際規範、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亦在此一脈絡下，持續發揮其影響國家學習的社會化歷程。

因此，本文希望藉由個人政治社會化的研究途徑來探究國家間所進行的國際社會化歷程，透過此一研究來剖析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規範、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如何透過上述的社會化建構國家間的共識，進而藉由互惠與互信的深化，達到穩固國際體系的目的。

貳、相關理論與概念的分析

在深入探討理論之前，必須先對於上述理論與概念提出說明，包括多邊主義、區域主義、國際建制與全球治理等相關概念進行分析，試圖理出國際社會化的脈絡。

一、多邊主義

多邊主義乃意指三個或更多國家間根據若干規範運作下的協調關係。據此，John Gerard Ruggie 認為多邊主義乃意指「存在於多個國家間用以協調彼此關係的若干規範」。^③Ruggie更申論，成功的多邊主義有賴於「擴散的互惠性」(diffuse reciprocity)，准此，每一個國家都必須相信「目前在某些權利的犧牲會產生長期性的回饋」，^④這也使得每個參與的國家並不會違背其承諾。James A. Caporaso更提出三個特性來分析多邊主義，亦即，不可分割性、普遍化的管理規則以及擴散的互惠性。^⑤其中，不可分割性是指多邊主義所涵蓋包括地理上與功能上的範圍內，組成單位與行動所散佈的成本與利益的估算，所以，根據集體安全的安排可知，當成員之一遭受到攻擊，就如同所有成員受到攻擊一般。普遍化的管理規則指的是普遍的規範告誡形式，

註③ John Gerar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s," in John Gerard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s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8.

註④ *Ibid*, p. 22.

註⑤ James A. Caporas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s," in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p. 53.

亦即所有成員在此規範下，皆被平等對待，無歧視性的待遇，並不因個別成員的國家偏好、情勢的急迫性以及優先特殊範圍而異。擴散的互惠性則是強調在不同議題領域中，參與國（會員）的長期性利益，這也是促使參與成員邁向「合作」的動因。

此外，Caporaso 更進一步提出三個理論的路徑來解釋多邊主義的行為。^⑥第一條路徑乃是由個體典範（individualist paradigm）所提供，國家以理性、自利的方式「進入」彼此間的契約關係中，是以國家、國家利益、能力、國家間互動的戰略為分析工具。第二條是社會溝通（social-communicative）途徑，其關注的焦點仍為國家的身份與權力，不過，國家的互動形式涵蓋溝通、勸服、深思熟慮以及自我反思。第三條路徑則是透過制度主義的途徑，強調個體行為者與制度的關聯，以及關注偏好、規範與信念間的關係。

因此，根據多邊主義的規範可知，參與國家藉由犧牲決策的彈性以及短期的獲益，來換取長期的獲利。這其中涉及到參與國著眼於未來獲益的認知，此種認知的維繫，是透過互惠性的規範所達成，而此一歷程則聚合共同利益的認知。從歷史的經驗可知，公海的規範、國際電報聯盟（International Telegraph）以及歐洲協調機制（the Concert of Europe），都有多邊主義的意涵。

由上述對於多邊主義的定義不難發現兩個核心的概念，就是參與成員（國家）間的「合作」以及「制度」雛形。「合作」是為了協調參與國家間的關係，而「制度」則是用以維繫合作關係的機制，進而達成長期利益的聚合。換言之，多邊主義強調著眼於長期的利益，而誘導參與國家犧牲甚至放棄當下的權利。當然，為了達成長期利益的實現，透過制度性的規範、規則來促使參與國家遵守承諾，這也強化區域主義的發展。

二、區域主義

根據 Bruce M. Russett 的說法，區域主義乃指地理位置具有鄰接性、人文傳統相近以及歷史上交往密切的國家所構築的自然地區，亦可指由某一地理界線所劃成的地區，甚至是指透過政治、軍事結盟所形成的區域概念。^⑦亦即，地緣關係並非為區域主義的必要標準，構築區域主義亦可由經濟層面、政治領域甚或軍事安全上的互賴，以及文化層次等非地緣關係作為衡量的標準。以下便從歷史與理論的脈絡來分析區域主義的實質內容。

註⑥ *Ibid.*, pp. 56~81.

註⑦ Bruce M. Russett,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Richard A. Falk and Saul H. Mendlovitz, eds., *Regional Politics and World Order* (San Francisco, Calif.: W. H. Freeman, 1973), pp. 181~187; 相關概念亦可參考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 Overview," in Mansfield and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4.

(一) 歷史的脈絡

若從歷史的脈絡分析二十世紀以來的區域主義，根據Mario Telo的見解，大致可將區域主義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乃是指從一次世界大戰後至一九五〇年代；第二階段則在一九六〇年代到八〇年代；第三階段則是一九九〇年代後迄今。^⑧在第一個階段；區域主義所展現的議題在於戰後秩序的重整、安全體系的建立以及經濟情勢的復興。國際聯盟的成立，代表著戰後安全與秩序的重建，而英國所扮演的霸權角色，也提供經濟制度的建立與維繫。

在第二階段：以美國為中心的霸權穩定理論，更奠定經濟區域主義的延展；其中，歐洲共同體（歐盟的前身）所推動的經濟暨貨幣政策，加速區域整合的契機。包括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等地區，也逐步開展區域整合的態勢。亦即，在此一階段，區域整合的歷程展現出區域主義的實踐。

而在後霸權時代的第三個階段，區域主義已成為新世界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尤其是區域組織的發展，偏重於整合功能的歷程，成為區域整合的象徵。包括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亞太經和會、安地斯共同體（Andean Community）以及南錐共同體（MERCOSUR）的成立等，都顯示出區域主義深化與廣化的軌跡。

區域整合運動的開展，代表著區域主義逐步的國際組織化。早在一八二八年，普魯士就已建立關稅同盟，更逐步促使巴伐利亞邦的關稅同盟、中德的消費聯盟、德意志關稅同盟、北德稅務聯盟的建立，最後成為德意志統一的重要關鍵。此波的整合效益在一八四八年擴溢至瑞士，並促成瑞士的市場與政治聯盟的整合，^⑨歐洲地區區域整合的歷程，請見表一。

由上述對於區域主義的描述可知，區域主義在「合作」的面向上，明確指出主體性，亦即，不論是安全領域或是經濟領域，都是區域主義所關注的焦點。此外，在「制度」的層次上，延續多邊主義的長期性利益觀點，鑲嵌合作的載體，基於重複賽局的結果，使得區域整合的效益擴散，強化區域主義的推展。

註⑧ Mario Telo, "Introduction: Globalization, New Regionalism and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Regional Acto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Post-Hegemonic Era*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p. 1~5.

註⑨ 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

表一

年代	區域	歐洲地區
1823-1833		Bavaria-Wurtemberg Customs Union
1828-1831		Middle German Commercial Union
1834		German Zollverein
1834-1854		Tax Union (Steuerverein)
1838		German Monetary Union
1847		Moldovian-Wallachian Customs Union
1848		Swiss Confederation
1857		German Monetary Convention
1865		Latin Monetary Union
1875		Scandinavian Monetary Union
1944		Benelux (Customs Union between Netherlands and the Belgian-Luxemburg Economic Union)
1958		European Community
1960		Europ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1979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1993		European Union
2002		Euro

資料來源：Jacob Viner, *The Customs Union Issue* (New Y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50); Sidney Pollard,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1815-1970*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Jeffrey Frankel, *Regional Trade Bloc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二) 理論的脈絡

若從理論層次來分析區域整合的內涵，則可分為政治科學途徑與經濟學途徑。

1. 政治科學途徑

區域整合的政治科學途徑主要透過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與政府間主義來進行分析。

功能主義是由 David Mitrany 所倡議的，他認為整合是一個過程，是一個逐漸走向和平與繁榮的過程，更是一種和平階層（working peace）。^⑩此種過程必須藉由國際功能性的制度—國際組織—所構築的工作網絡來運作，透過「分枝說」（doctrine

註⑩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Chicago, Ill.: Quadrangle Books, 1966), pp. 90~92.

of ramification) 來強化功能性合作的擴散性，^⑩亦即，某一部門的功能性合作會有助於其他部門的合作，或是開啓其他部門合作的動因。功能主義者認為整合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過程，功能性的合作是由低階層政治領域，包括經濟與社會生活開展，基於社會對於經濟利益的需求，透過合作建立共同的認知，以跨越國界的經濟力、社會力的流動來達成目的。透過全球經濟整合所建構的榮景將是形成穩定與和平的國際體系之屏障，而經濟的統一最終會促成政治的統一。^⑪總之，功能主義者是藉由功能性國際組織的擴散，誘使國家之間在低階層政治的領域進行合作，最終希望能達成政治統一的目標。

新功能主義則是由 Ernst Haas 所提出。Haas 認為整合可以增進國家間的互動，提升民族國家各自所處環境之聚合的過程。新功能主義者更強調經濟整合應以區域為場域，不僅重視超國家組織的建制，更對組織的目標、範圍、內部之權力結構、決策程序等議題提出建議。^⑫新功能主義者提出三個整合的核心概念：功能性外溢 (functional spillover)、政治性外溢 (political spillover) 以及提升共同利益。

功能性外溢是基於在現代化工業經濟的不同部門間存在著高度的互賴，某一部門的任何整合行為不僅會達成最初始的目標，更創造出與相關部門更進一步的行動。^⑬政治性外溢則是描述適當行為的過程，包括漸進式的期望轉變、價值的改變以及參與國政治利益團體與政黨在功能性部門進行跨國的聯合，亦即，透過菁英層級進行功能性的合作，除了修正觀念與行為外，更進一步達成政策的外溢效果。^⑭提升共同利益是透過制度化機制來扮演成員間的協調者，誘使參與者接受提升共同利益的建議，並尋求妥協之道，進一步強化核心制度的權力基礎。

政府間主義是由 Andrew Moravcsik 提出，他認為政府間主義是指在某一區域中，居領導地位國家間的政府領袖，透過一連串談判的進行，來達成整合的歷程。^⑮在區域整合的議題上，一方面，國家利益是由經濟互賴所形成的限制與機會產生。另一方面，國家間談判的結果是取決於相關政府的權力與功能性的誘因，透過制度的場域來降低交易成本以及達成各自國內所重視議題的期望。政府間主義著重於各國政策偏好，在整合的過程下，透過談判來進行聚合。

註⑩ *Ibid.*, p. 97.

註⑪ Inis L. Claude Jr., "Swords into Plowshares," in Karl Deutsch,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378~391.

註⑫ 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47~49.

註⑬ Leon Lindberg,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0.

註⑭ 參見註⑬, p. 409.

註⑮ Andrew Moravcsik, "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2 (1991), pp. 19~56.

2. 經濟學途徑

區域整合的經濟學途徑，包括關稅同盟理論（Customs union theory）、最適貨幣區域理論（Optimal currency area theory）以及財政聯邦主義（Fiscal federalism）。

關稅同盟理論是由 Jacob Viner 所提出，不同於功能主義與新功能主義聚焦於制度與過程，其研究重心在於貨物市場以及關注上述市場非歧視性福利的合併。^①根據 Viner 的論述，關稅同盟的建立需包含減少內部的貿易障礙以及達成非會員國入口關稅的同等化，透過上述的效益，將使得成員國家間的交易成本更為降低，而更加增加因整合所獲得的淨收益。

最適貨幣區域理論不同於關稅同盟，其目的在於創造貨幣同盟，而此一理論之先驅者為 Robert Mundell。該理論包含兩個核心的概念，第一：在此一貨幣區域內，不僅存在共同貨幣的流通，其匯率亦是固定不變的。第二：在上述的貨幣區域內，在不受到貨幣與財政政策干涉下，有能力完成內部平衡（完全就業與低通貨膨脹）與外部平衡（支出平衡）。^②

財政聯邦主義是公共財政理論的分支，主要是探討聯邦國家內所引起特殊的財政問題，包括公共財、稅賦、公債的影響等議題。許多探討財政聯邦主義的議題，都與研究區域制度的建立相關，特別是歐洲的例子——在歐盟會員國間，關於自由貿易與資本流動，朝向貨幣同盟的歷程以及財政協調的意願性等。^③亦即，財政聯邦主義的貢獻不僅在於促成經濟整合的適當政策協調，更連結私有市場與創造新制度的演進。

不論從政治學或是經濟學的理论途徑，區域主義透過功能性的外溢效果，不僅促成議題的連結，更強化各國政策的趨同性，這種連結與趨同性，都鑲嵌著共同利益的認知，透過學習來延展功能性的外溢效果。

三、國際建制

如何解釋制度（institution）？其概念與體制抑或建制（regime）有何差異？對於兩者在概念上的定義，可以廣泛到「意旨所有的國際關係或特定議題內的相關事務，或者狹隘到只是國際組織的同義字」。^④

Hedley Bull 將「均勢、國際法、外交機制、強權國家管理體系以及戰爭」視為「國際社會的制度」，^⑤ Douglass North 把制度定義為「規則、規則的強制性特徵、

註① Jacob Viner, *The Customs Union Issue* (New Y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50), pp. 12~20.

註② Robert Mundell, "A Theory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4 (September 1961), pp. 657~665.

註③ 參見註①, p. 38.

註④ Arthur A. Stein,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y World,"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15.

註⑤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74.

穩定人類相互作用的行為規範以及降低不確定性」。^②

概括而論，Stephan Haggard與Beth A. Simmons對於何謂國際建制提供三種思考的方向：第一類的定義最為廣泛，將建制等同於定形化的行為，亦即Puchala與Hopkins所主張的：「只要有某些原則、規範或規則的存在而得以對行為產生形塑的作用，當然，建制可存在於國際關係的各項實質議題中，甚至於強權間的競爭」。^③

Puchala與Hopkins更總結出國際建制的五大特徵：第一，建制本身是主觀的，是作為參與者對於合法性、適當或道德行為的理解而存在。第二，國際建制應包括有關何為正確的決策程序的原則規定。第三，建制的描述除了包括其原則性的特質，還應含括禁止越矩行為的規範。第四，每一種機制都擁有一套進行實際操作的菁英。第五，只要在議題領域中存在可辨識的模式化行為，機制則存在於國際關係中的任一實際的議題領域之中。^④

第二類的定義則較為嚴謹，即「國際建制是國家間為規範某特定議題內的國家行為而產生的多邊協定，並以明文規定來界定國家的行為範圍」。^⑤第三類的定義則是一般研究者所共識的定義：

「行為者對國際關係特定的期望所聚合明顯或不明顯的一套原則、規範、規則及決策程序。原則是對於事實、因果關係及公正的信念。規範是就權利及義務角度而定義的行為標準。規則則是對行動的特定規定或禁止。決策程序則意指決定或集體抉擇時的一般慣例」。^⑥

John J. Mearsheimer則認為「制度」乃指一套能規定國家間相互合作與競爭的規則，這些規則是透過國家間的談判來達成彼此接受較高規範的權利與義務的約束。^⑦Keohane認為「國際制度」是指用以規範行為的權限、限制行動以及影響行為者期望的持久性互動的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規則。^⑧DiMaggio將制度視為一相對穩定的規範與規則的集合，藉以定義在特殊情境下對於特別團體的適當行為。^⑨透過規範與規

註②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 163.

註③ Donald Puchala and Raymond Hopkins, "International Regimes: 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7), pp. 244~245.

註④ *Ibid.*, pp. 246~247.

註⑤ Stephan Haggard and Beth A. Simmon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1987), pp. 493~495.

註⑥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s Consequence: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pp. 1~21.

註⑦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5), pp. 8~9.

註⑧ 參見註②, p. 3.

註⑨ James G. March and John P. Olsen,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3 (1998), pp. 948~949.

則的建立，可以產生幾種效益：③第一，規則可以增加特定國家交易的數量。第二，透過規則的實行，可以結合國家在不同議題領域之互動。第三，規則的結構能增加資訊獲得的數量，同時也強化監督的緊密性。第四，規則的另一個重要功能在於降低個別協議的交易成本。

由上述學者對於建制與制度的定義分析可知，兩者皆重視規範、規則的建立，透過規則的運作帶動「降低交易成本」、「降低訊息的不確定性」、「消除外部效果」、「創造合作的條件」。亦即，「制度」或是「建制」，提供行為者一個「場域」，在此場域中，透過規範的建立，提供彼此間合作與競爭的規則，強化行為者間的政策協調與行為的趨同，降低互動成本，進而促使持續性互動關係的延續。本文中則視制度與建制為等同的概念。

四、全球治理

冷戰結束之後，隨著全球化浪潮的推展，全球治理成為國際社會所關注的一個議題，要理解這一個概念之前，必須先釐清治理與善治的理論。

「治理」的定義也因不同國際組織與機構所發表的正式報告，對於闡述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的概念，形成相異之處。世界銀行於一九九二年，即以名為「治理與發展」（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的年度報告中，闡述「治理」的概念，亦即，政權的形式；當局為發展而執行之處理該國經濟、社會資源的過程以及政府得以設計、形成與運用政策與執行功能的能力。④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ECD）於一九九六年發佈「促進參與式發展與善治的項目評估」（Evaluation of Programmes Promoting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Good Governance），報告中，將「治理」定義為使用政治權威與行使其在社會中與其經濟、社會發展有關之資源處理的控制。⑤

而聯合國開發署（United 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一九九六年以「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治理、管理的發展和治理的分工」（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Management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Division）為名的報告中，認為「治理」是被視為執行經濟、政治與行政權威以處理國家在各層次的之事務。包含了機制、過程與制度，並由此使得公民、團體能明確表達其利益、運用其法律權利以達到其義務與調和彼此差異。⑥

根據James N. Rosenau的說法，「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標所支持的，此目標未必

註③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5), p. 18.

註④ 張亞中，〈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主權與權力的解析〉，《問題與研究》，第40期第9卷（民國90年），頁3。

註⑤ 同上註。

註⑥ 參見註④。

出於合法的以及正式規定的職責，它既包括政府型態機制，同時也涵蓋非正式、非政府型態的機制。亦即，「治理」依賴主體間的重要性程度，並不亞於對正式頒佈的憲法與典章的依賴。^④

而 R. Rhodes 認為，「治理」意味著統治意義的轉變，指涉一種新的統治過程，抑或既定規則情形的改變，或是統治社會的一套新方法。並由上述的定義，將「治理」區分六種不同治理定義：^⑤被視為最小國家的公共服務；如同公司的管理；作為新的公共管理；是一種善治；如同社會控制的體系；是一種自我組織的網絡。

Gerry Stoker 則是對於「治理」提出五種主要的觀點：1. 治理意味著一套來自於政府卻又不受限於政府的制度與行為者；2. 治理意指在尋求社經議題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存在界線與責任的模糊性。3. 治理意味著在集體行動中各個制度之間的權力依賴關係。4. 治理表示行為者的自我治理網絡。5. 治理意指處理事情的能力，而且並不限於依賴政府的權力或透過權威發佈命令。^⑥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降臨，人類生活因之產生重大的變革，其中，最引人注目之一，乃在於政治過程的重心由統治走向治理，從善政邁向善治，由政府的統治走向沒有政府的治理，從民族國家的政府統治走向全球治理的道路。

准此，全球治理就是規則加上國際性。^⑦其目的使得世界中的互賴行為者有能力去解決衝突情勢，緩和集體問題及更易於促成合作的態勢，上述涉及兩個明確的政治過程，亦即，議價與訂契約。前者意味著行為者基本於成本與利益的考量，對於衝突、合作的議題達成共識，後者則是將議價的結果付諸實現。基於無政府狀態的前提，國家間的議價與契約化過程，都需依照各自國家的利益考量為基準，而在全球範疇的國際社會，基於安全困境、制度維繫、經濟互賴等議題，更顯現出規則制度化的重要性。

全球治理的政治過程如何進行？由前述的論證脈絡可知，從多邊主義的不可分割

註④ James N. Rosenau,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 Order and Chanc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

註⑤ R. A. W. Rhodes,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Political Studies*, Vol. 154 (1996), pp. 652~667.

註⑥ 原文如下：1. Governance refers to a complex set of institutions and actors that are drawn from but also beyond government; 2. Governance recognizes the blurring of boundar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tackling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3. Governance identifies the power dependence involved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stitutions involved in collective action; 4. Governance is about autonomous self-governing networks of actors; 5. Governance recognizes the capacity to get things done which does not rest on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to command or use its authority. It sees government as able to use new tools and techniques to steer and guide; Gerry Stoker,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155 (1998), pp. 17~28.

註⑦ David A. Lake, "Global Governance: A Relational Contracting Approach," in Aseem Prakash and Jeffrey A. Hart, eds.,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33.

性、普遍化的管理規則以及擴散的互惠性，到區域主義所論及由經濟層面、政治領域甚或軍事安全上的互賴，甚至於文化層次交流以及國際建制在特定議題層次的規範，乃至於全球治理領域所強化的治理概念，都在在凸顯參與行為者在「議價」與「契約化」過程中的互動。其互動進行的「場域」即為「國際組織」。首先，透過分析國際組織正式的規章、委員會的組成以及條約的制訂，可剖析國際社會如何調和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的困境。再者，藉由分析國際組織制度化的過程，尤其是在各參與國國內及國際層次的決策體系的分析，更能明瞭國際社會是如被治理的，當然，共同目標亦成為參與國家間所凝聚的共識，而全球層次的利益，就成為「治理」的實質內容。

國際組織不但提供上述理論、概念進行實踐的場域，更使得參與國家在此一場域中，進行國際學習。透過此一學習過程，一方面使得參與國家學習到不再藉由衝突為工具，來增進及強化自我的價值，另一方面，則由前述的認知轉變，進而改變其意圖。這必須透過規則、規範來減少衝突，使得國家行為者在學習到建構法制化制度的過程中，獲得更佳的結果。這一概念如同個人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受到包括家庭、學校、同儕團體等媒介的影響，並從中獲得與學習的經驗與對象，進行增強或改變自身的政治行為態度。

不過，全球治理亦有需處理的問題。第一，藉由非國家行為者對於全球事務的積極參與，能使公共問題凸顯重要性。只是，若從參與者的互動關係分析，治理的主體以及治理方式就必須更加予以釐清。此外，當參與者增加而議題範圍與數目亦隨之增加，集體共識的凝聚亦隨之困難，治理效率亦會隨之緩滯。第二，集體行動背後所引藏的公共財、及其所伴隨的搭便車與外部效益問題，將直接衝擊治理的有效性。^③

五、理論與概念的相關性

綜觀以上所述，根據各個理論與概念的特質，歸納出以下的分析，藉以導引出國際社會化的概念。

透過表二的分析，上述的四種理論抑或概念，基於解決衝突、強化合作的共識，藉由規範的制約，促成國際學習的動機，透過媒介（國際組織）的運作，提供參與國家間互動的場域，溝通彼此的意見與協調政策的一致，最終達成更為深化的互賴關係。在此歷程中，類似於個人「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亦在國家行為者之間開展。對於國家而言，在其社會化的歷程中，相較於個人的政治社會化歷程，其影響變數較為多元與複雜，以下便就國際（國家間）的社會化概念，進行分析。

註③ 袁鶴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台中：若水堂股份有限公司，民國93年2月），頁153~158。

表二

	多邊主義	區域主義	國際建制	全球治理
地理上的鄰接性	無	有	無	無
規範的制約	著眼長期利益	強	強	強
合作的動因	互惠的擴散	整合效益	制度的建立	沒有政府的治理
國際學習程度	低	高	高	高
霸權國的影響	高	強權國家間的共識	制度建立初期影響大	低
國際組織的運作	低（僅具備雛形）	強	強	強
最終目標	長期利益的考量	功能性合作	藉由制度強化合作	增進全球人類的福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國際社會化的概念

本文對於國際社會化意涵乃根據 Frank Schimmelfennig 所提出的定義，加以逐步強化。Schimmelfennig 認為，「國際社會化是一種過程，亦即引導一個國家朝將國際環境所構築的信念與規範予以內化的過程」。^⑨根據上述的定義，國際社會化則意涵幾種概念上的抉擇：第一，社會化乃指涉一種過程而非結果。亦即，行為者將信念與實踐予以內化的過程。第二，內化是指將所採取的社會信念與實踐導入行為者認知與行為的曲目之中。其中，內部懲戒機制能否有效發揮制止脫軌的偏好成為破壞規範的行動以及獲取資源的資格界定，就成為關鍵所在。^⑩第三，在國際政治領域的社會行為者，都是團體性的行為者。不同於個人透過心理學層次的內化概念，國家社會化乃是團體行為者的行為，主要是基於內部懲戒機制的運作來運行。最後，社會化過程的實質內容，主要是以信念與實踐的概念推展為要，而社會化的核心功能在於社會秩序的再製與擴散，當然，透過制度化的機制來建構上述的內容，就至為關鍵。

註⑨ Frank Schimmelfennig,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 Rational Action in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1 (2000), pp. 111~112。

註⑩ Robert Axelrod, "An Evolution Approach to Nor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80 (1986), p. 1104; James Coleman,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London, U. K.: Belknap Press, 1990), p. 293.

此外，部分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者也論及到對於國際社會化概念的看法。Kenneth Waltz認為國際社會化是一種自發的、非正式的以及無意圖的過程。透過社會化的過程，國家間不但變得相似，更基於成功地實踐社會化內容而達到涉入國際體系的功能。^①

Ikenberry 與 Kupchan 將社會化概念化為一種學習的過程，亦即行為者將規範與理念傳遞給其他行為者的過程。至於如何傳遞，他們提出三個假設來解釋上述的信念與規範，主要是霸權國透過次級國家的菁英社群來達成此一歷程。^②此外，他們提出物質的誘因與實質的信念在國際社會化過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其中，物質的誘因是透過懲罰的威脅或是獎勵的承諾來改變行為者的政治或經濟層次的動機；而實質的信念則是藉由國際規範與價值傾向的內化過程來達成。他們不同於 Waltz 的觀點，他們認為國家的社會化是基於霸權國為了維持其霸權的持久性與成本的降低，透過物質的誘導與懲戒來主導次等國家間的規範內化。^③

Finnemore 和 Sikkink 則將國家社會化定義為積極的機制，藉由國際體系所建構清晰的規範，透過結合實質懲戒與象徵國家間同儕壓力的驅使來達成。^④當然，社會化意指個別國家的信念轉變以及如何將國際規範內化到國家內部的制度結構中。Martha Finnemore 認為，國家社會化意指持續進行且存在的認知與社會過程，而此一過程，是藉由國際的互動構築國家的認知與利益。亦即，在國際環境的場域中，國家透過社會化的過程進行學習。^⑤

Kai Alderson 則認為國家的社會化過程，有三個特性：^⑥第一，國家社會化是行為者個體信念的轉變。第二，社會化的過程是政治性的。第三，規範的內化主要取決於規範能為其內部制度結構提供的獲益大小。就其論述可知，國家社會化意指國家內化源自於國際體系的規範的過程，此外，Alderson 更進一步指出規範內化的三個過程：行為者個體信念的轉變、政治壓力與勸服以及制度化。

國際社會化的概念，主要是指將社會信念與規範透過制度化的機制予以內化到行為者認知與行為之中的過程，其中，再經由制度化機制所建構的懲戒機制來達成目標的成效，最終促成社會化內容的再製與擴散。其中，「霸權國的影響」、「國家的學習」、「共同利益的認同」、「法制化」與國際組織的角色就至為關鍵。以下便就前述的理念、概念脈絡所導引出國際社會化的分析變數，一一進行分析。

註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 1979), p. 128.

註② John G.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 (1990), p. 284.

註③ *Ibid.*, pp. 283~293.

註④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Norms,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 Insights from Sociology's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2 (1996), pp. 325~347.

註⑤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7.

註⑥ Kai Alderson, "Making sense of state soci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2001), pp. 415~433.

肆、國際社會化的分析變數

一、霸權國的影響

根據本文對於國際社會化的定義，國際社會化是指引導一個國家朝將國際環境所構築的信念與規範予以內化的學習過程。亦即，此種社會化的歷程可經由三種機制來達成，規範的勸服、外在的誘導以及內部的再建構過程。^④而霸權國的角色便在此三種機制中，展現其影響力。

在規範勸服的歷程中，霸權國透過與次級國家菁英的接觸，藉由這些社會菁英內化霸權國所建構的規範與採行與其相符的政策，產生合作的結果。其因果關係主要是透過合法性的支配來達成，亦即，經由霸權國展現規範的勸服行為，導致次級國家的規範轉變，其路徑乃是經由菁英社群的驅策，形成政策的改變以及將相關條約與規範予以內化至國家的法律結構之中，藉此達到國家的社會化。

再者，霸權國會透過經濟與軍事誘因而誘導其他國家轉變政策方向。其因果關係來自於霸權國提供經濟與軍事層面的誘因，促使次級國家產生政策轉變，（當然，這是基於上述兩個領域的強迫性角色所形成的合作結果）最後導致規範的改變。

最後，霸權國透過直接干預次級國家內部的政治轉型來重新建構該國家的國內與國際政治層面的規範。其因果關係主要是藉由次級國家進行國家內部的再建構過程中，霸權國透過干預其轉型歷程，形成該國家在政策上的改變，（當然，這是施壓的結果）最後導致規範的轉變。

由上述分析可知，霸權國家在國際社會化進行的過程中，在國際層次，主導國際規範與秩序的建立，透過勸服、誘導與再建構的歷程，將國際規範導入次級國家的行為曲目之中。而從國家內部層次分析，藉由與其內部的菁英接觸，強化其理念的傳輸，進行影響國家的行為。亦即，霸權國主導著理念與規範的結構成因，促成合作的態勢，強化制度的成因。

二、國家學習

根據 Jack S. Levy 的說法，經驗性的學習是指信念的改變、新觀念、技術與程序的發展，用以解釋與說明所涉及的經驗。^⑤大部分學者對於學習的定義，皆聚焦於和平或合作的議題之上。Joseph S. Nye 認為學習只是與合作相關的可能結果；^⑥ Janice

註④ 參見註①, p. 290.

註⑤ Jack S. 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1994), pp. 283~284.

註⑥ Nye將學習區分為簡單學習（simple learning）與複雜學習（complex learning）。前者指透過新資訊的使用，去調適達成目的的方法，而不會改變所設定的目標。後者則是對衝突情勢的認知產生轉變，導致目標與方法的調整，進而產生新的優先考量與交易情事；參閱 Joseph S. Nye, 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2 (1987), pp. 371~402.

Gross Stein 僅視學習是衝突減緩與解決的途徑之一，^⑤而 Ernst B. Haas 則認為學習是管理互賴關係的途徑。^⑥

亦即，對於個別國家而言，學習的研究主要是關注於決策者信念的改變，進而導致政策的轉變，上述幾位學者的論述，皆將學習視為外交政策轉變的解釋，而國家行為者則是從國際環境之中，獲得學習的動因。國家學習乃是介於國際轉變與外交政策轉變之間的過程，此一過程的核心鑲嵌著資訊傳達。亦即，個人將其從外部環境中所獲得的資訊，轉換到團體決策的機制中，達成政策轉換的歷程。

根據以上的論述可知，國家的學習過程需說明幾個問題：^⑦第一，國家學習必須解釋介於由決策團體與國家知識間所擁有知識的關係。第二，集體學習理論必須解釋個體行為者如何將資訊轉換成政策的產出。第三，集體學習理論必須解釋，當若干條件改變時，個體行為者如何察覺決策環境中重要的變數。第四，集體學習理論必須解釋，何以一群人由其所考慮的方案中擇一為政策產出，假設此決策團體並不考量所有的可能性，他們必須解釋何以簡化其分析的過程。

國家學習的過程，不僅是資訊如何轉換成政策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如何將個人學習的歷程，推至國家層次。Philip E. Tetlock 提出五種分析途徑來詮釋國家學習的歷程：^⑧第一，新現實主義途徑：學習是涵蓋理性的政策調適來回應國際環境的獎勵與懲戒。第二，信念體系途徑：學習包含行為者對國際環境意象認知內容的改變以及以最佳方式去處理環境的變遷。第三，認知結構途徑：學習是對國際環境意象認知結構的改變，此一改變是在更為複雜的領域（在一套信念中，會產生不同的爭論，而這些爭論之間又有程度上的不一致）與更具備自我批評的能力之中。第四，組織與政治文化途徑：學習包括在制度的程序或文化規範下的改變，以形塑政府何以回應國際事件。第五，學習效率的概念：學習應該是獲取比過往更具效率的能力，包括使用更為合適的方法，或是追求更為實際的目標。

綜合以上的論述，國家行為者藉由國際環境的轉變所形成的刺激因素，造成其認知內容與結構的改變，透過內部制度化的決策過程，將所獲得的資訊，透過比過往更具效率的分析途徑，轉化成為政策產出的動因，使得國家行為者對於國際社會的轉變，做出適當的反應與政策的回應。不論從接收國際環境的刺激、自身認知結構的改變、

註⑤ Janice Gross Stein, "Image, Identity,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Chester A. Crocker and Fen Osler Hampson, eds., *Managing Global Chaos: Sources of and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6), pp. 93~111.

註⑥ Ernst B. Haas, *When Knowledge is Power: Three Model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4, 128.

註⑦ Andrew Farkas, *State Learning and International Change* (Ann Arbor, Mich.: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p. 3~5.

註⑧ Philip E. Tetlock, "Learning in U. 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Search of an Elusive Concept," in George W. Breslauer and Philip E. Tetlock, eds.,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1), p. 22.

制度化的機制運作、以致於政策的產出，都緊緊鑲嵌著國家學習的因子，這更促使國際社會化的開展。

三、共同利益的認知

國際社會化的運作因素之一，乃在於參與者的集體認知與共同利益的交會，透過認知與利益的結合，使得行爲國家之間能凝聚共識，建立集體的行動目標，促使彼此間的行爲學習動因，達成國家社會化的推動，強化國際社會化的歷程。而Liesbet Hooghe與Gary Marks認爲此種集體認知與共同利益的展現，主要可由以下幾個指標來建立：戰爭、經濟利益、文化以及政治制度。^④

就戰爭的影響而言，一方面，戰爭會創造出一種「我類對抗他者」的心態與社群的集體認同，並且有助於將不同的社會團體整合於多族群的社會之中，就如同美國與蘇聯的情形。另一方面，基於對戰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使得國家間會尋求透過合作機制來降低因資訊的不確定性所形成的誤判，並藉由制度的運作，降低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並創造出共同的利益。

在經濟利益的層面，主要關鍵在於合作條件的創造。透過制度的建立，能夠提供國家行爲者之間尋找出共同利益的場域，而共同利益包括了資源的分配，進而強化了合作的可能性。此外，在「複雜互賴」的概念運行下，國家間議題層級的消失以及變得更具多樣性。這意味著國家之間各類問題並無等級之分，而且，議題本身也呈現出多樣性的態勢，亦即，軍事安全已不再成爲國家之間最爲重要的議題，經濟議題便展現其重要性。如此，更強化經濟利益調和的重要性。

若從文化層面分析，認同的建立來自於語言、族裔、宗教信仰的同質性以及社會交易的過程。不過，在多元化的國際社會中，共同的認知取決於經驗與文化的分享，此一分享的歷程來自於成員國與參與者之間在社會與經濟層面的互動，藉由多元化的互動，不僅強化文化的同質化，更深化認同的建構。

正式的政治制度，就國內層次而言，涵蓋議會、行政部門、法院等，不僅行塑了認知的符號與形象，更提供了政治參與以及政策制訂的管道。就國際層次而言，政治制度隱含合作的場域，國家行爲者之間透過制度所建構的機制，進行決策的歷程，達成共識的凝聚。

四、國際組織的作用

個人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會受到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大眾傳播媒體等媒介的影響，對於個人在政治行爲定向的學習與政治行爲模式的形塑，形成不同程度的效果。對於國家而言，影響其國際社會化的媒介，則需由兩個層次分析，一爲國際層次，另一則爲國內層次。國家透過與媒介的互動及其所展現的影響力，使得國家產生如同心

註④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European Union* (Boston, Mas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pp. 60~65.

理學理論中的學習、認知與社會認同的效果。^⑤

國際社會化的過程需要在社會化媒介與被社會化的行為者間產生結構的不對稱狀態。^⑥媒介扮演著資源守門員的角色，行為者為了得到獲取資源的資格，行為者將會採取由社會化媒介機制所建構的信念與實踐。透過這種對結構依賴的誘導，產生成為國際社會成員的學習過程，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受懲戒，另一則是希望獲得酬庸，其最終目的在於政治目標的達成，這意味著國家行為者會基於理性的思維，透過學習的過程，達到自利的最大化。

此外，對於進行國際社會化國家的內部媒介，則是以理念與知識傳遞的知識社群為分析對象，知識社群透過溝通新的理念與政策革新，致力於影響自政府的政策選擇。根據 Peter Hass 的說法，所謂的知識社群乃意指：「在特別領域中被公認具有專業知識與才能，並在其所專長領域中得以權威的主張政策與相關知識之人士所形成的專家網絡」。^⑦亦即，知識社群透過其所提供的知識來塑造政治行為者的知覺，並促使其向某些政策與規則靠攏。

換言之，透過知識社群所提供的知識與理念，一方面有助於形塑政治行為者的知覺，使其傾向選擇某些政策、規範及規則。另一方面，透過理念與知識的接收、轉化與改變，將可能使得決策者改變其達成目標的策略，甚至重新定義國家利益，並調整政策的趨向。

五、法制化

「法制化」包含三個要素：^⑧第一，約束性，乃指國家或其他行為者受到單一或一套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則與承諾所約束。第二，精準性意指清楚的定義上述規則及承諾所需求、允許以及禁止的行為。第三，委任性，透過權威性的授權去執行、解釋與提供規則，並解決爭議以及制訂更為深化的規則。

正如在研究國際建制領域中，主張強的認知論者（strong cognitivists）所採取的觀點，透過國際社會途徑或合法性力量，使得國家行為者在法制化的國際社會中行爲，並且強調認知在國際社會中建構理性選擇的角色，亦更進一步說明國家藉由社會化以及規範與信念的內化歷程對於所構建出制度延續的影響力。^⑨

註⑤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Colin H. Kahl, "Constructing a Separate Peace: Constructivism, Collective Liber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eace,"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1999), pp. 94~144.

註⑥ 參見註⑦, p. 117.

註⑦ Peter Has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1 (1992), p. 3.

註⑧ Robert W. Abbott, Robert O. Keohane, Andrew Moravcsi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uncan Sinidal, "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3 (2000), pp. 401~419.

註⑨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Integrat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p. 3~33.

准此，藉由內部懲戒機制的運作導引出國際社會化的核心概念之一，亦即，「法制化」的機制。如何形成「法制化」的機制？透過「制度」的載體，鑲嵌出「正當性」的路徑，使得社會化在「法制化」與「正當性」的引導下，讓國家與其他行為者內化國際社會所構築的信念與規範。

此外，正當性成為國家基於自利的考量而進行社會化過程的核心因素之一。國家透過制度化的機制，制訂出規範、通則、秩序、信念與決策過程，建構合法性的權威，而理性的行為者更視合法性為其獲取政治權力、改善其權威地位的資格以及增進其治理能力的資源。

透過上述五項分析變數，不僅建構出國際社會化的概念，更將其概念予以操作化，以下便以歐洲的經驗，來分析國際社會化經驗性的個案。

伍、個案研究——經濟暨貨幣聯盟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

二次大戰之後，國際社會間基於現實環境的考量以及本身經濟發展的需要，透過結盟或是聯盟的方式，結合彼此的經濟力量，凝聚彼此的共識，以集體的力量來抵禦外來的競爭，因而促使以貿易自由化為主的區域經濟整合態勢，在各區域間應運而生。對歐盟而言，在共同市場建立之後，藉由良好的經濟整合基礎，進一步向更深層的目標邁進。歐洲單一法施行之後，歐洲共同市場（歐盟的前身）本身為求內部市場計畫能夠落實「無國界」的貿易區，並進一步深化共同體的整合歷程，於是致力於推動「經濟暨貨幣聯盟」的計畫，經由條約的明文規定，使其成為各會員國必須遵守及實踐的政策性目標。

EMU 的推動，看似經濟層面的政策，實際上，則是牽動著政治面的決定。歐盟國家在邁向整合的道路上，經由經濟整合的效益拓展至政治層面的合作，是較切合實際情勢的做法，當然，經由半世紀的努力，歐盟國家能否藉由經濟整合的歷程而跨越至政治層面的合作，EMU 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本文的個案研究即以 EMU 的制定過程來了解歐盟在經濟整合與政治整合的前景，並對於未來政策的制定，分析其決策的歷程。

在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中，各會員國對於 EMU 的實施情形，訂出三個階段來達成，^⑩並對各會員國加入 EMU 之經濟條件予以明確的規範。此一跨越各國鴻溝的整合契機，無疑是強化了歐盟整合的進展。當「經濟暨貨幣聯盟」形成之後，歐盟各會員國（目前有 11 國加入，英國、希臘、丹麥、瑞典暫不加入）間將使用單一貨幣（Euro）來進行所有對內與對外的交易，同時配合共同一致的經濟政策

註⑩ 根據一九八九年四月，歐體執委會主席狄洛（J. Delors）所提出之「狄洛報告」（Delors Report）中所建議，由全體會員國採行一致之貨幣與經濟政策，在執行政序上分為三階段，並將列入於馬斯垂克條約中。

以及本身誘人的廣大市場，勢必對於美國的霸權地位形成衝擊，也提供區域整合模式更為深化的典範。當然，歐盟本身在國際社會地位的提升，自然不在話下。

一、經濟暨貨幣聯盟政策之意涵

歐盟所推動的「經濟暨貨幣聯盟政策」，有著提升歐盟整體整合歷程的意涵。而 EMU 政策所代表的意義為何？主要可從以下兩方面來了解：

第一、在貨幣聯盟層面：

(一) 發行新的單一貨幣以取代各會員國個別所使用的貨幣

1. 歐洲貨幣聯盟主要的任務即發行一種能與各會員國個別國家所使用的貨幣，在其所代表的意義上，相互齊值（等值）的單一貨幣，以取代各會員國現有的貨幣流通。

2. 設立一個最高管制機構——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負責管理與發行單一貨幣。

3. 歐洲中央銀行負有達成平衡、穩定物價之責。

4. 以歐元做為各會員國間流通之貨幣

歐盟會員國將採行新的單一貨幣——歐元，此一貨幣將在會員國之間作為貨幣的流通單位，包括在商品以及各項服務的支付、外匯及股市交易以及會員國政府的債務事宜，均將以歐元為支付單位。

(二) 單一貨幣的實施

參與貨幣聯盟的 11 個會員國之貨幣匯率將自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起固定，而且維持不變（希臘於二〇〇〇年六月十九日的歐盟高峰會議中，被確認符合一致性標準，並於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為 EMU 第 12 個參與國）。一旦歐洲貨幣聯盟的信心建立之後，歐元將成為實行單一貨幣區域內的主要使用之貨幣，進而取代各會員國各自所使用的 11 種貨幣。

第二、在經濟聯盟層面：

經濟聯盟為 EMU 另一個重要的目標，其主要的意涵包括：

1. 各會員國在人員、財貨、勞務及資本方面得以自由流通之單一市場。

2. 強化歐盟市場機能為目的之競爭政策以及其他相關的政策。

3. 針對結構的改變與區域發展制定出共同一致的政策，進一步對區域內各國的經濟政策做階段性的協調，逐漸廢除經濟政策的差異。

4. 協調預算政策限制規定在內之總體經濟政策。^①

由此可知，EMU 的政策目標是將歐盟整體導入完全整合的經濟領域之中。當然，在 EMU 所促成的經濟整合歷程中，也涵蓋了部份的政治整合情境，藉由 EMU 的整合效益，使歐盟向政治整合的終極目標，更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註① Wyn Grant,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Policy*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pp. 191~194.

二、會員國凝聚共同利益的認知——EMU 所形成的誘因

對於參與該政策的會員國而言，EMU 的成立與歐元的起跑，凝聚了共同利益的認知與共識。就經濟領域而言，將可以帶來預期的利益包括了：^②

- (一) 各會員國之間的匯率與交易成本將會降低；
- (二) 增加通貨膨脹率的穩定；
- (三) 有利於資本市場規模的擴大，增加投資的機會；
- (四) 新興市場的開放，創造無限的商機；
- (五) 避免貨幣的浮動與不穩定所造成的成本；
- (六) 金融界與企業界的垂直整合，以強化跨國競爭；
- (七) 歐元發行將對美元地位形成壓力；
- (八) 減緩各會員國失業率的差距；

就政治領域的誘因而言：^③

- (一) 擴展各會員國對於歐洲整合的範圍；
- (二) 歐元的推動帶動更進一步的政治整合；
- (三) 增進各會員國之間歧見的化解；
- (四) 提升對鄰近區域的政治影響力；
- (五) 提升歐盟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實力；
- (六) 爭取世界強權的地位

三、國家的學習——EMU 所設定的標準

會員國加入EMU之標準為：(1) 會員國的通貨膨脹率不得超過前一年通貨膨脹率最低三個會員國平均值的 1.5 %；(2) 會員國的政府預算赤字不得超過 GDP 之 3 %；(3) 會員國之政府負債不得超過GDP之 60 %；(4) 會員國的長期利率率不得超過前一年通貨膨脹率最低三個會員國平均值的 2 %；(5) 會員國貨幣的匯率波動，應維持在歐洲匯率機制中心匯率上下 15 % 以內。

透過標準的設定，促使歐盟會員國家之間學習歷程的開展，藉由相關政策的調整來達成上述的指標，進而取得身份的認同，並獲得相對的利益。

四、媒介的作用、法制化的歷程—— 歐洲貨幣聯盟推行的歷程

歐盟在推行貨幣聯盟時，依據實際情況的需要，制定出整合的時間表，以利單一貨幣的實施。以下便將其所制定的時間進程，予以介紹：

註② 王啓明，「歐洲聯盟政策制訂過程之個案研究」，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5期(民91年9、10月)，頁93~94。

註③ 同上註，頁95~96。

(一) 第一階段

一九九二年二月，藉由馬斯垂克條約的簽署，開啓歐盟在二〇世紀結束之前，創建歐洲經濟及貨幣聯盟的目標。根據狄洛報告與馬德里高峰會議（Madrid Summits）的決議，^④自一九九〇年七月一日起，正式進入EMU的第一階段。^⑤此一階段的進度在於：單一市場的整合、結構基金（Structure Fund）的改革，以強化區域均衡的發展以及貨幣與匯率政策的協調。

(二) 第二階段

一九九四年一月，第二階段開始實施。^⑥各會員國依照立法程序建立「歐洲貨幣機構」（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ion, EMI）以作為歐洲中央銀行（ECB）的過渡時期機構。此階段的重點在於以EMI加強與各會員國中央銀行的合作，協調會員國貨幣與經濟政策。

(三) 第三階段

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起，第三階段開始。^⑦主要的工作在於參與EMU的各會員國間之貨幣匯率將其固定，採行單一貨幣政策及使用統一貨幣歐元，並對於歐洲中央銀行的運作程序做出最後的決定。一旦各會員國達到匯率穩定、低通貨膨脹、低及穩定之政府赤字等經濟條件，即發行單一貨幣。

藉由歐盟提供建立規範的場域，會員國間透過條約的簽訂來達成法制化的規範，強化約束性，提升合作的進程，逐步朝向目標邁進。

五、霸權國的態度（強權國家間的態度）

(一) 德國

二次戰後的德國，在國際社會所扮演的是被動的角色。因為德國無法追求軍事與

註④ Trevor Salmon and Sir Willaim Nicoll, *Building European Union - A Documentary History and Analysis* (London, U. 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24~228.

註⑤ Emmanuel Apel,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1958-2002*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102~113; Kenneth Dyso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European* (London, U. K.: Longman, 1994), pp. 23~41; Barry Eichengreen and Jeffrey Frie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Monetary Unifica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4), pp. 6~28; Jurgen von Hage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and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2), pp. 11~18; H. M. Scobi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 The Way Forwar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40~53.

註⑥ Apel, *op. cit.*, pp.122~136; Dyson, *op. cit.*, pp.73~91; Eichengreen and Frieden, *op. cit.*, pp. 31~47; von Hagen, *op. cit.*, pp. 21~38; Scobie, *op. cit.*, pp. 61~83.

註⑦ Apel, *op. cit.*, pp. 142~156; Dyson, *op. cit.*, pp. 101~122; Eichengreen and Frieden, *op. cit.*, pp. 51~67; von Hagen, *op. cit.*, pp. 48~65; Scobie, *op. cit.*, pp. 92~107.

領土的自主性，只能藉由創造有利於本國的國際市場，形成區域及全球的經貿互賴。在德國統一之後，基於本身的經濟實力、民族主義情結，使德國邁向世界強權的心態，漸趨成形。不過，統一前後的德國，對於歐洲政策的推動上，尤其是特定政策方面，就產生不同的立場。以 EMU 政策為例，統一後的德國要求歐元必須持續維持穩定、國家主權讓渡的必要性、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特性需被確保以及加入門檻的設定，甚至以其本身加入與否作為議價的籌碼。^⑧

當然，德國希望結合歐盟整體的力量，提升其在世界舞台影響力的政策方向是不變的。所以，歐盟的合作範圍越廣，德國的影響力便能拓展至更多的領域之中，這對德國則越是有利，因為，在歐盟中，德國仍是具有影響力的國家。

(二) 法國

法國曾是一個稱雄歐洲、影響世界的強國。其傳統的對外政策，乃是秉持恢復「法蘭西光榮」為使命，希望能走出戰後的陰影，重建法國在歐陸及世界強權的地位。對於歐盟事宜，法國採取的態度為在維持主權國家獨立運作的空間下，由法國領導歐洲整合的走向、法德合作為基礎，並與英國保持距離以及排除美國介入歐洲事務的聯盟。

亦即，「歐洲應屬於歐洲人的歐洲」，歐洲國家對於 EMU 政策更是凝聚空前的共識，成就了貨幣整合的時代性發展。對於法國而言，從歐盟整合的態勢分析，經濟層面整合的成功與否，直接牽動政治合作的開展，更是衝擊著該國在歐洲社會的影響力。所以，推動 EMU 以強化經濟面的整合，是法國的政策傾向。

(三) 英國

英國傳統的對外政策即以「三圈政策」(Three Cycle Policy) 為主體，包括了全球主義、大西洋主義與歐洲主義。基於歐洲主義的原則與歐洲國家維持著同步不同調的態勢。由歷史事實來看，英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舉足輕重，對於歐陸，亦有著成為歐洲領導者的期望。只不過，二次大戰對於英國的衝擊相當大，也使得英國喪失掌握主導歐洲發展的先機（因為從歐洲共同體的建立開始，即為德、法兩國量身訂做），而在形勢上也只成為反應式的政策，做被動的政策配合者甚至批評者。不過，英國亦試圖在歐盟的機制之中，能調整其所扮演的角色，爭取領導歐洲的地位。

英國在歐盟整合的重要歷程中，均採取一致的立場，主張「經濟整合」及「漸進發展」政策，其目的在於維持本身權限的前提下，再尋求合作的契機，這一直是英國所堅持的基調，這可從英國所簽署條約中的輔助性條款、選擇性條款及一致決條款可看出端倪。^⑨由上述分析可知，歐盟內主要的強權國，對於 EMU 政策，雖有不同的考量，但在強化合作的認知下，仍有一致性的態度，亦是促成該項政策成行的關鍵。

由 EMU 政策的推動可看出歐盟會員國透過國家學習、制度的建立，與法制化的

註⑧ 沈玄池，「德國的歐洲政策與歐洲整合之路」，當代，第169期（民國90年），頁45。

註⑨ 洪德欽，「喪失歐盟主導權——英國如何看歐洲整合」，當代，第169期，頁63~64。

結合以及媒介的運作和強權國家的支持，將區域整合的理念落實到歐盟整體的發展上，國際社會化更在理念落實的同時，啟動國家間的內化歷程。當然，國際組織提供會員國進行勸服、合作的場域，更強化國際社會化的進展。

陸、結 論

相較於個人的政治社會化歷程，國家的社會化過程包含以下幾種特色：第一，對於個人的政治社會化而言，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大眾傳播媒體等媒介所扮演的角色，被動性的功能較為明顯，亦即，當個人涉入媒介的情境中，與其發生互動後，才形塑出社會化的結果。對於國家而言，在其社會化的歷程中，媒介的角色就顯現出主動性。透過制度、規範、規則的建立，使得被社會化的行為者（國家），需達到門檻，才能獲得認同，進而取得身份與資格，達成社會化的結果。第二，相較於個人的社會化過程，國家在進行社會化的歷程時，本身則較具主動參與性，透過國家政策的制訂，朝向達到「標準」的門檻邁進。第三，國家的學習，並不同於個人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狀態——而是有實質目標與學習對象（例如，制度下的規範或是其他國家的政策協調）。第四，國際社會化中媒介的另一項重要的功能在於其扮演著資源守門員的角色。國家為了得到獲取資源的資格，將會採取由社會化媒介機制所建構的標準與制度，透過這種對結構依賴的誘導，產生成為國際社會成員的學習過程，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受懲戒，另一則是希望獲得酬庸，其最終目的在於達到自利的最大化。

由於本文試圖將個人社會化的研究途徑與概念（尤其是將研究主體從個人移植到國家層次，將國家視為國際社會環境下的行為主體），藉由理論建構的過程，將國際社會化的研究由概念化進程至操作化，分析出影響國際社會化的結構因素，希望對於國際關係的研究領域，能提供另一種思維模式。

* * *

（收件：92年6月17日，修正：93年：10月11日，接受：93年10月18日）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Chi-ming Wang

Ph.D. Program,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individuals shape their political behavi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 try to use the concept of “state socialization” to explore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new Europe” are shaped by a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n which the West community transmits its constitutive liberal norms to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y analyzing the context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regime,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Legalization; State Learning

參考文獻

- 易君博 (1993), 《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 台北: 三民書局出版社。
- 袁鶴齡 (2004), 《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台中: 若水堂股份有限公司。
- 洪德欽 (2001), 「喪失歐盟主導權——英國如何看歐洲整合」, 《當代》, 169: 63-64。
- 沈玄池 (2001), 「德國的歐洲政策與歐洲整合之路」, 《當代》, 169: 45。
- 張亞中 (2001), 「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 主權與權力的解析」, 《問題與研究》, 40: 9, 3。
- Alderson, Kai (2001), "Making Sense of State Soci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 415-433.
- Axelrod, Robert (1986), "An Evolution Approach to Nor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1104.
- Apel, Emmanuel (1998),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1958-2002*, New York: Routledge.
- Barbezat, Daniel and Larry Neal (1988), *The Econom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Europe*, Oxford, U. 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aporaso, James A. (199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s," in John Gerard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s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51-90.
- Claude, Inis L. Jr. (1969), "Swords into Plowshares," in Karl Deutsch,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78-391.
- Coleman, James (1990),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London, U. K.: Belknap Press.
- Curzon Price, Victoria (1999), *The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Issue and Strategie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 Dyson, Kenneth (1994),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European*, London, U. K.: Longman.
- Eichengreen, Barry and Jeffrey Frieden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Monetary Unifica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Farkas, Andrew (1998), *State Learning and International Change*, Ann Arbor, Mich.: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Feldstein, Martin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Political Sources of Economic Liabil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

- search, August.
- Finnemore, Martha and Kathryn Sikkink (1996), "Norms,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 Insights from Sociology's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0: 2, 325-347.
- Finnemore, Martha (1996),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rant, Wyn (1993),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Policy*,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 Hagen, Jurgen von (1992),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and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Haas, Ernst B. (1964),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When Knowledge is Power: Three Model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ss, Peter (1992),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1, 3.
- Haggard, Stephan and Beth A. Simmons (1987),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3, 493-495.
- Hooghe, Liesbet and Gary Marks (2001),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European Union*, Boston, Mas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Ikenberry, John G. and Charles A. Kupchan (1990),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3, 283-293.
- Kahl, Colin H. (1999), "Constructing a Separate Peace: Constructivism, Collective Liber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eace," *Security Studies*, 8: 2, 94-144.
- Keohane, Robert O. (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Lake, David A. (1999), "Global Governance: A Relational Contracting Approach," in Aseem Prakash and Jeffrey A. Hart (eds.),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London U. K.: Routledge.
- Levy, Jack S. (1994),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 2, 283-284.
- Lindberg, Leon (1963),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ttli, Walter (1999),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 Europe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trany, David (1966), *A Working Peace*, Chicago, Ill.: Quadrangle Books.
- Mayhew, Alan (1998), *Recreating Europe-The European Union's Policy towards Central*

- and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Helen V. Milner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 Overview," in Mansfield and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4.
- March, James G. and John P. Olsen (1998),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4, 948-949.
- Mearsheimer, John J. (1995),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 8-9.
- Moravcsik, Andrew (1991), "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 2, 19-56.
- Mundell, Robert (1961), "A Theory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4, 657-665.
- Nikolaj, Petersen (1996), "Denmark and the European Union 1985-96: A Two-level Analysi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1: 2, 85-210.
- Nye, Joseph S. (1987),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2, 371-402.
- Paul De Grauwe (1994), *The Economics of Monetary Integration*, Oxford, U. 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uchala, Donald and Raymond Hopkins (1987), "International Regimes: 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2, 246-247.
- Rhodes, R. A. W. (1996),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Political Studies*, 1154, 652-667.
- Riker, William H. (1982),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San Francisco, Calif.: W. H. Freeman.
- Ruggie, John Gerard (1993),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s," in John Gerard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s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48.
- Russett, Bruce M. (1973),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Richard A. Falk and Saul H. Mendlovitz (eds.), *Regional Politics and World Order*, San Francisco, Calif.: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Press, 181-187.
- Rosenau, James N. (1995),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 Order and Chanc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almon, Trevor and Sir Willaim Nicoll (1997), *Building European Union - A Documentary History and Analysis*, London, U. 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Scobie, H. M. (1998),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 The Way Forward*, New York: Routl-

edge.

- Schimmelfennig, Frank (2000),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 Rational Action in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 1, 111-112.
- Smith, Martin A. and Graham Timmins (2000), *Building a Bigger Europe - EU and NATO Enlarge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shgate publisher.
- Stoker, Gerry (1998),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55: 17-28.
- Stein, Janice Gross (1996), "Image, Identity,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Chester A. Crocker and Fen Osler Hampson (eds.), *Managing Global Chaos: Sources of and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93-111.
- Telo, Mario (2001), "Introduction: Globalization, New Regionalism and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 - Regional Acto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Post-Hegemonic Era*, New York: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5.
- Tetlock, Philip E. (1991),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Search of an Elusive Concept," in George W. Breslauer and Philip E. Tetlock (eds.),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22.
- Viner, Jacob (1950), *The Customs Union Issue*, New Y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
- 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2, 391-425.
- Wolf, Dieter and Bernhard Zangl (1996),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Two-level Game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3, 355-393.